

## 【案例一】

# 绿色 GDP 变身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停摆”三年多的绿色 GDP，有望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崭新面目，重回公众视野。然而，先前绿色 GDP 在“约束地方行为”方面所面临的难题，这套新的指标体系并未解决

“停摆”三年多的绿色 GDP，有望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面目，重回公众视野。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历时一年半设计、论证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已进入各部门会签阶段，等待上报国务院批准。

一位参与了指标体系开发过程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的指标体系涵盖了资源、环境、生态和应对气候变化四大领域的核心指标。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该指标研究组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应对资源环境变化的重大关系和规律做了深入研究，整合了分散于各行业部门的资源环境统计信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

从指标的具体设置上看，不仅有当期消耗、排放指标，还有资源存量指标、环境指标和生态质量指标。此外，由于内容全面，范围较广，这一指标体系还包括即将进入“十二五”规划的新约束性指标。

“作为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由发改委等综合部门发布，可以避免不同部门各自表述所带来的片面性和信息不一致。”绿色 GDP 课题组的核心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高敏雪说。

新指标体系开始实施后，除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指标要对应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其他三大类指标计划每年发布一次。

## 绿色 GDP 大事记

◆ 2004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成立了绿色 GDP 核算课题组，建立了环境经济核算的技术方法体系。

◆ 2005 年，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安徽、浙江、四川、广东和海南 10 个省市开展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污染损失评估调查试点工作。

◆ 2006 年 9 月 7 日，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 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首次公布。这是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 核算研究报告。

◆ 2007 年，绿色 GDP 课题研究小组获得了“2006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然而代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却透露，绿色 GDP 核算并没获得所有省份的支持，部分省份已退出核算。

◆ 2008 年 8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召开多部门会议，启动《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工作。

◆ 2009 年 3 月，《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专题讨论会召开，广泛听取各方意见。7 月，再次征求意见。

◆ 2009 年底，《中国资源环境核算体系框架》进入多部门会签阶段。

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发展证明，其迫切需要一套能够覆盖资源 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以反映资源环境状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然而试图以一记红字标识传统 GDP 中资源环境代价的努力，最终没能突破由核算方法和地方政绩观 设置的双重障碍。“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整套度量体系，在当前绿色 GDP 不可行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可以为宏观决策提供支撑，反映国内行动。”上述 官员评价说。

虽然该项制度无意清算——清算传统 GDP 减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经济代价后所剩几何，然而制度的设计者相信，由于此次纳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都是当前可以测算、统计并提供数据的指标，这使得整个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得以保证。

### 命运多舛

早在两年前，决策层就在考虑绿色 GDP 的出路。2008 年 8 月奥运期间，一场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会议在中南海悄然进行。来自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环保部、水利部等十几个部门的官员为命运多舛的绿色 GDP 寻找出路。

发布于 2006 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是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 GDP 核算报告。彼时，占据了 GDP 超过 3% 的环境污染损失，敲醒了盲目 GDP 崇拜的警钟。

接下来的两年内，绿色 GDP 课题组的成员们初步核算出了森林、水等资源的初步结果。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绿色 GDP 课题组成员於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针对环境污染损失的核算，当时已经推进到了 2008 年度。至于何时能再见核算研究报告，却没有人能知道。

正如一位接近国家统计局的人士所说的，被视作过分激进和理想主义的绿色 GDP 核算，“昙花一现之后就偃旗息鼓了”。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迟迟不能公布，其间有多种原因。其中方法论上的裹足不前，主要源自将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用货币化方式进行综合核算时存在诸多问题。“资源环境如何货币价值化？很多时候还难以做到客观度量，必须在一定的假设下给出带有主观性的结果。”高敏雪解释说。

这意味着，带有一定主观性的核算结果，虽然有意义，但还没法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常规指标来使用。

环境保护基金的经济学家 Gernot Wagner 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GDP 衡量的是市场交易，它并不包括你享受闲暇时光的价值，你在家看孩子的价值，更无从反映你窗外那棵大树制造氧气的价值。

曾登上“2006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领奖台的高敏雪，习惯在措辞上使用更为全面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非俗称的“绿色 GDP”一词。

以环境污染核算为例，在其看来，如果能够将全部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损失计算出来，并从 GDP 中扣除，是更理想的核算目标。但更容易实现的，则是将各个经济部门污染物排放指标与该部门的经济产出指标并列起来，计算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些同样属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如果不具备相关条件，你可以不计算绿色 GDP，而是采用这些具有实物性质的指标。”高敏雪说。她还追加了一句，即使可以计算出绿色 GDP，同样需要这些具有明确意义的实物 指标。

## 约束力欠缺

显然,不管是决策层,还是研究者都将目光投向了相对更容易实现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绿色 GDP 受阻后,高敏雪和其他几位成员又投入到了新指标体系的研究开发中。

然而,制度设计者同样清楚: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缺陷显而易见。指标体系要保证可操作性,采取了以实物量为主的设计思路,当前纳入体系的指标主要来自已有的基础数据,而价值量的指标相对较少,需要完善和补充更多相关指标。

简单来说,绿色 GDP 的目标是用价格来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失,而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则只是表现大气、水、森林等资源的总体数量,而避免为其定价。

“尽管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前的资源环境状况,并以此显示发展的可持续性,但作为一个指标体系,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本身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高敏雪说。

更大的欠缺则来自新指标体系对地方经济发展行为约束力的匮乏。在绿色 GDP 公布“难产”之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曾担心无以扭转地方畸形追求 GDP 的政绩观。同样,用以替代绿色 GDP 的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在“约束地方行为”上,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境遇,如要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配套和制度完善。

“当前开发的指标主要应用在国家层面上,或许会给各个省市提供范本,促使其逐步建立对应的指标体系并公布统计结果,但其本身并没有强调地区分组,没有强调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因此短期内可能难以在约束地方行为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新指标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的高敏雪并不袒护这个系统的先天不足。

与几年前绿色 GDP 在 10 省市试点时的热闹、惟一一次公布时的反对情形相比,这一次地方显得异常平静。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询问的几个省市自治区,均表示新指标体系应与绿色 GDP 不甚相关。

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说,他更期待制定环境统计法建立一套独立于统计系统之外的环境统计机构,让每个企业至少拥有一名自己的环境会计。他还期待看到一张动态的物质流量表,严把一进一出两个关口。

“在修补现有的统计框架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就需要考虑超越。”杨鹏说。

## 【案例二】

# Measures of well-being

## Chilled out

A poll contradicts what we thought we knew about income and happiness

Feb 25th 2012



DESPITE global economic gloom, the world is a happier place than it was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began. That is the counterintuitive conclusion of a poll of 19,000 adults in 24 countries by Ipsos, a research company. Some 77% of respondents now describe themselves as happy, up three points on 2007, the last year before the crisis. Fully 22% (up from 20%) describe themselves as very happy—a more important measure, says Ipsos's John Wright, since whenever three-quarters of people agree on anything,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ntensity in the results.”

All such polls come with a health warning. The level of happiness is self-reported—and the term means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The Ipsos poll, measuring degrees of happiness, is not strictly comparable with those that ask about “well-being” (such as Gallup) or “life satisfaction”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so it is har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conclusions against other efforts. The margin of error is wide, at plus or minus 3.1 points for most countries. Still, Ipsos has been doing its survey regularly for five years and the figures have proved fairly stable during that time, not wildly volatile which they would have been if they had been flaky.

Two conclusions emerge. Large, fast-growing emerging markets do not share rich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pessimism. The already large “very happy” cohort rose 16 points in Turkey, ten points in Mexico and five points in India. Even rich-country pessimism is uneven. The share of “very happy” people rose six points in—of all places—Japan, defying tsunami and nuclear accidents. But growth amid global misery does not explain everything: the biggest falls in happiness also occurred in large emerging markets, in Indonesia, Brazil and—a perennial miseryguts—Russia.

The second conclusion challenges the received notions of mankind's moods. A tenet of political science is that happiness levels rise with wealth and then plateau, usually when a country's national income per head reaches around \$25,000 a year. "The richer a country gets," argued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in "The Spirit Level", an influential book of 2009, "the less getting still richer adds to the population's happiness." Many on the left have concluded that pursuing further economic growth is pointless. Even right-wing politicians such as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and th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have set up projects to study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But the Ipsos study shows the highest levels of self-reported happiness not in rich countries, as one would expect, but in poor and middle-income ones, notably Indonesia, India and Mexico. In rich countries, happiness scores range from above-average—28% of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say they are very happy—to far below the mean. The figures for Italy and Spain were 13% and 11% (Greece was not in the sample). Most Europeans are gloomi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So levels of income are, if anything, inversely related to felicity. Perceived happiness depends on a lot more than material welfare.

### 【案例三】

## 以国民幸福指数为纲的不丹寻找经济发展良方

2011 年 07 月 14 日 14:5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 12 月 21 日电）以“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为治国纲领的不丹王国，最近似乎违背了传统的快乐哲学，正全力拚经济，已与麦肯锡顾问公司签了 900 万美元合约，希望麦肯锡能为不丹找出快速提升经济成长率的方法。

据台湾《联合报》21 日报道，不丹在 1970 年代开始计算“国民幸福指数”，自此成为不丹的治国指标。所谓“国民幸福指数”，是把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未纳入的指数，例如休闲时间、森林面积和国民情绪等纳入计算的经济指标。

在英国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 2008 年登基后，把政权交给民选的内阁制政府，“国民幸福指数”仍是不丹的骄傲，已写入宪法，政府最近把监督经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改名为国家幸福指数委员会。

但不丹近半的国家预算靠外援，23% 预算由印度提供。仰赖外援令不丹不安，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外援缩水，因此扩展经济成为填补预算缺口的唯一办法。不丹民选政府已立下远大目标，要在未来 10 年每年经济成长达到 9%，与印度和中国的增长率一较长短。

在跨国顾问公司的协助之下，政府希望观光业游客数能增长 4 倍，达到每年 10 万人次，并大兴土木筑路和建电厂，不丹的电力还能输出到印度，是经济的支柱，但问题是，不丹人乐天的哲学能适应这样的经济发展吗？这个议题已经在国内引起辩论。反对党领袖说：“我不认为（麦肯锡）客服中心符合国民幸福指数的精神。”

不丹过去一向着重保存传统文化甚于经济发展，人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999 年才有第一台电视，公共场合禁止抽烟，民众抱怨交通信号灯不美观，因此首都没有信号灯，8 成民众住在村子里。全国 70 万人口逾五分之一人口在贫穷线以下，日薪不到 0.7 美元。不丹的新民主政权必须向选民证明，经济成长和幸福指数能并存，并向年轻一代保证，他们能有更多工作机会、更好的收入和更好的教育。

当权者担忧，如果经济搞不好，新的民主政体可能瓦解。国家领袖见到邻国尼泊尔自 2006 年建立民主制度后，经济停滞，人民上街抗议，令他们心生警惕。

请认真阅读上面三则案例后，回答下列问题：

1. 请简述课堂所学的三种 GDP 计算方法。你认为 GDP 反映了社会福利的哪些方面？又有哪些方面没有反映？GDP 衡量当中存在哪些问题？
2. “绿色 GDP” 针对 GDP 进行了哪些修正？你认为这些修正有必要吗？你认为还有哪些应该修正而没有修正的？绿色 GDP 在衡量当中存在哪些困难？
3. “国民幸福程度” 是一个更好地反映社会福利的指标吗？为什么？“国民幸福程度” 与 GDP 在哪些方面是一致的？又有可能在哪些方面不一致？“国民幸福程度” 存在哪些衡量上的问题？
4. 你还知道哪些衡量国家居民生活状态的标准？你认为其中哪个指标最为合理？或者你认为如何构造一个更合理的指标？如果将衡量的容易程度综合考虑在内，你觉得哪个指标是最好的？